

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2-0108-05

文人之“学”与学者之“文”

——对《中国新文学大系》三篇《导言》的解读

刘克敌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主要以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之《导言》为例,来具体分析“作家”鲁迅的“治学”与“学者”鲁迅的“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通过对与鲁迅同时撰写的,由茅盾、郑伯奇写作的两篇《导言》进行对照性的解读,可以发现三位作家在治学时的学术框架和治学心态的差异,特别是三篇导言在论述相同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或明显或微妙的差异,更可看出他们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经历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同时,通过比较,也可以在互相观照中进一步彰显鲁迅之《导言》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2.017

对于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者而言,1936 年由赵家璧组织鲁迅、茅盾、胡适、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分别编选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绝对不可能不重视的史料。其中由各卷编选者所撰写的《导言》更是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本文即主要以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之《导言》为例,来具体分析“作家”鲁迅的“治学”与“学者”鲁迅的“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对与鲁迅此篇同时撰写的另外两篇《导言》进行对照性解读,以求在互相观照中彰显鲁迅之《导言》的独特价值。

首先必须注意到,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和五四时期白话小说成绩最杰出者的鲁迅,当他以学者和评论家身份出现时,如果要总结概括第一个十年之小说创作,那么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对自己小说的评价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评价,如果过分谦虚,显然不符合文学史实际,因为一方面这毕竟是学术性论文,是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一部分的文

字,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出尽可能科学的论述。另一方面,鲁迅自己的白话小说也确实值得给予高度评价——无论是从作品自身价值抑或从作品的影响方面都是如此。那么,既然是学术性文字,既然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就不应该考虑论述对象是否和自己有关——甚至就是自己。且看鲁迅对自己的评价: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介绍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

收稿日期:2015-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门派传承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4BZW141)。

作者简介:刘克敌(1956-),男,山东泰安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和文艺思潮研究。

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1]

整体而言,鲁迅对自己的评价是准确和到位的,但语气还是相当谦虚,如其中的“算是”、“技巧稍微圆熟,刻画也稍微热情”等字样。如果与该文中鲁迅评价其他小说家所使用语言比较,则鲁迅的自我评价是相当压制甚至有些苛刻。但对于自己小说在五四时期的特殊意义和社会影响,鲁迅还是给出了符合事实的评价:第一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其次是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至于艺术性方面,鲁迅给自己的评价是“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这其实也是当时评论界对鲁迅作品的一致意见。

而另外两篇《导言》的作者茅盾和郑伯奇,他们如果要评价鲁迅,其实可以更加客观——因为郑伯奇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批评;茅盾那时虽然已经创作小说,但对于自己所批评的对象却可持相对客观态度,因为这第一个十年中没有自己的小说。所以,这三篇《导言》中,鲁迅这篇是典型的作家兼学者之作,而其余两篇可以认为是较为纯粹的文学批评家之作。又由于三篇《导言》论述内容各有分工,由此导致三篇《导言》在论述框架、观点阐述和论述风格等各方面的差异——甚至有暗暗的观点上的交锋。就如对于鲁迅小说的评价来说,固然因为分工的不同,茅盾主要论述文学研究会而郑伯奇论述创造社,但作为具有文学史意味的“导言”——既然写作“导言”的初衷是对第一个十年进行总结,又怎能不对新文学最初的白话小说进行源头上的梳理?所以茅盾不管怎样,还是在文章开头,对鲁迅的小说创作给予高度评价:“民国七年(1918),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出现的时候,也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2](P82)}相形之下,郑伯奇之“导言”文章在开头大谈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却对鲁迅的白话小说只字不提,其中缘由当然要归结于创造社与鲁迅的论争。还有,郑伯奇的“导言”多次引用茅盾“导言”中内容,却没有一次引用鲁迅的《导言》——或许是鲁迅就没有给他看过,

或者是看过也不想引用?不管怎样,对鲁迅及其作品给予臧否或是保持沉默,其实都是一种态度。

茅盾和郑伯奇的《导言》,由于各自的分工问题,必然要对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成立、观点以及发展过程有所交代,这方面的论述两人大致相同,只不过是各自站在维护各自社团的立场而已。相比之下,鲁迅所论述的是这两大社团之外的其他小说家,所以鲁迅的评价相对比较自由。加之鲁迅又是以这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中实际参与者和引导者的身份出现,所以他的评述更加具有权威性和文学意味,其对各种小说流派创作特色的评述既言简意赅又挥洒自如。而另外两篇则更多富有纯理论色彩和论辩意味,如二者均把这第一个十年分为前后两个五年,并一直认同后一个五年成绩更为显著——这多少也在证明他们各自的社团的进步,虽然按照郑伯奇的说法,是“对立的发展”并且是“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的还有,尽管郑伯奇的《导言》中不乏对茅盾之《导言》的引用甚至观点的赞同,但在整体上还是可以体会出这两个社团的代表人物对各自社团小说成绩的赞美以及对对方观点和小说创作成绩的不以为然——尽管语气是淡淡的甚至是模糊的。事实上,在肯定自己这一派小说成绩的同时,就意味着对方成绩的不如自己——因为双方是“对立的发展”,自然这发展不会处于同样的水平。且看以下两段文字:

因为只是“著作同业公会”的性质,所以“文学研究会”的简章第九条虽有“本会会址设于北京,其京外各地有会员五人以上者,得设一分会”之规定,而且事实上后来也有几个分会,而且分会也发刊了机关报,然而这决不是“包办”或“垄断”文坛,像当时有些人所想象。^{[2](P86)}

中国新文学团体中,组织较广,历史较久,影响最大而对立也最强烈的,要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但,文学研究会,诚如茅盾先生所说,‘绝不是包办或垄断文坛,像当时人有些人所想象’,然而久而久之,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渐渐固定了,变成了一个同人团体,那却是不容否认的。^{[3](P148)}

双方的立场截然对立,而且语气十分坚决。一个是“决不是包办”,一个是“不容否认”,算得上势同水火,毫不退让了。其实,两人所看重的,还是如何占领话语制高点的问题,或者说是夺取文坛领导权的问题。正因为此,所以郑伯奇才对文学研究

会要在各地发展分会的条文进行指责,而茅盾也才会对此作出详细的分辩。相比之下,鲁迅由于所处地位,对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外的那些小说所作评价,还是较为公正客观——不过仍有例外,如不谈沈从文,尽管沈从文早在1924年就开始大量发表小说并获得广泛的关注。这应该和鲁迅对“新月派”的反感以及所谓的“京派”与“海派”之争有关。自然,没有绝对的公正客观,何况每个人都权利对文学史做出评价,只是这评价无论怎样偏激,但至少在学理上要立得住,方为一家之言。整体看,茅盾和郑伯奇的“导言”更像是学者之文,而鲁迅的“导言”却是体现“文人之学”的佳作——既有文采,也有学识。

不过,鲁迅之《导言》所最重要之价值,在于昭示出与《中国小说史略》同样的文学史撰写思路和鲁迅的史家眼光。诚如温儒敏所言:“鲁迅的《小说二集》导言,堪称是文学史的经典学术之作,最好与其《中国小说史略》联系起来读,那样可以更好地体味鲁迅治文学史的思路。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导言善于从复杂的文学创作流变中抽取有典型意义的‘现象’,以这些典型‘现象’为点,去把握文学发展的线索。这些典型‘现象’的点,表面上往往集结于某一社团流派,但鲁迅却并不止于介绍这些团派的面目,而更注重考察其作为‘过程’的表现。”^[4]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鲁迅提出了“乡土文学”这一概念,并在这一概念下对一大批作家作品进行了科学细致的梳理,从而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开启另一个新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赵树理等人的山药蛋派、孙犁等人的荷花淀派以及1949年后出现的一大批表现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都与鲁迅对“乡土文学”的肯定和大力推荐有很大关系。

所谓“乡土文学”,鲁迅是这样界定和说明的:

寒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

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许软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5]

这里鲁迅提到了“故乡”和“乡愁”——只因为鲁迅很早就写过“故乡”的,虽然他的《故乡》里面没有多少乡愁,而只有对故乡的感叹:“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所以鲁迅不仅是这一概念的提出者^①,更是这一类文学最早的创作者,那一句“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不正是鲁迅自己的感想吗?纵观鲁迅那些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小说,差不多都是以其故乡为背景的,而创作时间也都是在被生活所驱逐到的“异地”,所以鲁迅对于“故乡”的感情是复杂的,诚如夏志清所言:“鲁迅对于农村人物的懒散、迷信、残酷和虚伪深感悲愤;新思想无法改变他们,鲁迅因之摈弃了他的故乡,在象征的意义上也摈弃了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然而,正与乔伊斯的情形一样,故乡同故乡的人物仍然是鲁迅作品的实质。”^{[6](P26)}

从现代小说的发展来看,正如茅盾在其撰写《导言》中所说,五四白话小说在一开始差不多都是恋爱小说,不仅题材单一,而且水平很差。在这种情况下,乡土文学的出现,标志着作家视野的扩大和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情感小天地。而从文学史看,中国古代文学中本来就有悠久的“乡愁”情结,有大量优秀的咏叹山水田园之作,所以当小说成为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品种时,就是自然用于表现作家的乡土情结——这一“情结”由于五四之后很多作者的涌入城市而变为作者排遣个人愁绪和展示其对社会关怀的绝好题材。

耐人寻味的是茅盾的“导言”没有使用“乡土文学”这一概念,而代之以“农民小说”、“农村小说”等。这其中蕴含着对周氏兄弟的异议——虽然主要是针对周作人。其实,早在周作人使用“乡土

^①迄今为之,最早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是周作人。1910年在为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的中篇小说《黄蔷薇》撰写的序里,周作人肯定《黄蔷薇》为“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不过,这只是在介绍外国文学时所提及,且当时周作人的文章鲁迅当都有看过甚至两人多有互相署名情形。

文学”这一概念来介绍外国文学时,茅盾就提出了另一套话语来指代同样一批作品,茅盾所用的是“农民小说、农村小说或农民生活小说”,农民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是茅盾对20年代乡土小说给予表现的重点,而非周作人那样重视描写故乡之思、故乡景物和风俗人情——骨子里周作人所透露出的,还是古代士大夫的格调。

不过,在鲁迅正式提出“乡土文学”后,茅盾还是给予了应有的回应:

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7](P89)}

对于茅盾与周氏兄弟有关“乡土文学”解释之大体一致中的不一致,现代学术界有学者给予这样的评述:

从周作人到茅盾,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经过暗含争辩的酝酿期,初步形成了乡土文学发展的两个向度,其一是周作人所阐发的、以地方色彩、风土人情为特色的、趋于趣味主义的乡土文学;其二是茅盾所坚持的、以文学为人生为宗旨的、提倡反映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艰苦生活的农民文学。这两个向度被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中整合成相对完整的乡土文学理论。鲁迅一方面采用了“乡土文学”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坛有着杰出的创作实绩、并为国内外文学批评界广泛接受、认可的概念,另一方面又以自己启蒙主义的、改良人生的文学观为“乡土文学”注入了新的精神实质,而这种新的精神实质与茅盾一贯坚持的对农民生活、生存状况的关注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一致,茅盾暂时放弃了自己一直摇摆不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村生活的小说”等概念、术语,以后随着政治语境的变化,茅盾又沿用了以前的术语,但基本观点却没有大的变化。^[8]

上述评述大致准确,不过对于鲁迅使用“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是否最早其实并不特别重要,需要关注的是,应该结合鲁迅其他的文学史著作来看这一概念为何在新文学十年后被提出或使用——用来对新文学十年中一个相当突出的小说类别进行总结,其背后的理论考量又是什么?是否可以结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等论著中的有关论述来看鲁迅对中国文学中此类题材作品的一个整体态度或意见?也就是说,决不能仅仅把这篇导言以及茅盾和郑伯奇的导言看作是单纯的文学批评文章,更应看作是具有文学史意味的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种小说创作盖棺论定式的总结——这总结因为有了三个不同的版本而更能显示出立体感,三篇导言的互相呼应也好,互相对立也好,在肯定第一个十年小说成就方面却是一致的。这种不一致中的一致,正是文学史写作的极好案例。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指出,鲁迅在撰写这篇导言时,已经摆脱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并未将“五四”之后的小说看作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相反,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编选感言”中,倒是直言不讳地认为“二十年后的现在的有些作品,却仍然赶不上那时候的。”尽管那时候的“技术是不能和现在的好作家相比较的,但把时代记在心里,就知道那时候倒很少有随随便便的作品。内容当然更和现在不同了”。鲁迅显然是对他写此感想时的小说创作状况不满,所以才不无辛辣地讽刺说:“后来,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作品也大进步,只是同时也孪生了一个兄弟,叫作‘滥造’”。^{[9](P383)}

总之,鲁迅的这篇《导言》与其《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一起,构成了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其中所彰显出鲁迅的学术理念和文学史观,都对后世相关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所体现出的“文人之学”更值得我们从事学术史角度进行总结。

参 考 文 献

- [1] 鲁迅.鲁迅文集·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2] 茅盾.现代小说导论(一)[M].上海:上海书店,1982.
- [3] 郑伯奇.现代小说导论(二)[M].上海:上海书店,1982.
- [4] 温儒敏.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J].文学评论,2001,(3).
- [5]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 [6]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7]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8] 余荣虎.周作人、茅盾、鲁迅与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3).
- [9] 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Studies” of Literati and “Literature” of Scholars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ree Preambles in Collections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LIU Ke-di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crutinizes the Preamble of Vol. 2 in Collections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written by Lu Xun, and analyzes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udies by Lu Xun the "writer" and the "literary writing" by Lu Xun the "scholar". At mean time, through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eamble by Lu Xun and the Preambles by two other men-of-letters, it finds out the apparent and subt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authors in academic framework and academic mentalit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preambles in expounding similar issue particularly tell the influences of authors' writing experience on their academic studies. Through comparison, it further reveals the unique values of Lu Xun's Preamble.

Key words: Lu Xun; Collections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Preambles; values

(责任编辑:刘伙根 庄暨军)

(上接第 61 页)

On Service Module Values Network of Jiangxi: Elements and Structures

YU Chang-chun, ZHAO Xiao-n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service module values network on basis of Jiangxi cultural industries through dimensions of constitutive elements and structural forms. The network falls into two structural levels: internal industry net and external industry net, on which the whole network operates. At mean time, elements in- and out-industry service module needs an intangible network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thus realize proper operation through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service modulization; value network; constitutive elements; structural form; case analysis

(责任编辑:曾琼芳)